焦点人物

王斌:不惧失败的代价

■ 本报记者 袁 远

在中国大陆,从未有一家民企胆气如此之足,只身闯入高手云集的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。而王斌领导下的正威半导体集团,正倾注千亿元巨资打造中国大陆第一条半导体产业IDM(全产业链),誓言改变中国半导体产业"无心(芯)无魂无面子"的尴尬现实。

用专业精神影响政策

业内人士都能清醒地看到,政府在半导体产业连续投入巨资,却连利息都收不回来;扶持了一批半导体企业,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短短几年内"夭折";作为政绩工程建起的半导体产业基地,随着在任官员的卸任而停产,近百亿元投入也随之"雨打风吹去"……

王斌意识到,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半导体业发展得不够"绿色",而且会由于政府的急躁心理,而破坏了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。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、联动,仅靠产业界和企业的力量,又很难形成一个健康的产业环境,最终也无法让中国半导体业振翅高飞。

审时度势,王斌做出了艰难的选择——不花政府的钱,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获得支配权,但仍然和政府积极联动,在政策、税收等方面寻求政府最大程度的支持。

王斌深知,自己出资,如果研发失败,可能上亿元的资金都会打水漂,上半辈子的积累瞬间便会化为"失败的代价"。但如果离不开政府温暖的羽翼,拿不出壮士断臂的决心,中国半导体业或许真的就没有希望了。

曾经有机会进入国家体制内工作的王斌,只蜻蜓点水般地在中科院逗留了一年,便匆匆离去。个中缘由,王斌绝少同他人提及,却从未后悔过当年离开时的毅然决然。个人、产业、当下的体制,总是互为交融,如同一片屋檐下相伴多年的夫妻,耳鬓厮磨,撕不开,也难拆散。不过,王斌还是在自己和政治之间划了一道线,自己不会越线参与政治,也绝非对对方视而不见。政府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4号文件,在王斌看来就非常"内行",文件中提出的虚拟IDM(半导体上下游环节虚拟一体化)概念,给了王斌创新商业模式很大的启发。正威半导体和家电、通信、汽车等行业捆绑发展,也符合国家提倡的"用技术应用引领高科技行业发展"的产业指导方向。

当然,在王斌看来,现有的政治体制仍需要创新,否则就无法和科技领先的半导体行业良性对接。如何用专业精神影响产业制度,其难度不亚于赶超国际先进半导体技术,需要企业对政府做大量的培训、宣传工作,王斌甚至打算专门办一份报纸,持续不断地和政府"对话"。

依靠但不依赖政府,用专业精神影响政策而不是一味迎合政策,或许就是王斌保持自我的方式。

高科技人才"不好玩"

在海外,顶尖高科技人才通常都戴着一副"金手铐",就是被公司以股票期权、奖金红利等手段苦心留在高层管理岗位上,"中国到现在也没有制造出高端芯片,和这类人才及其匮乏密切相关。"王斌说。

千金易得,一将难求。更何况,这"将"还是性格"乖张"的孤独高手。

"和这帮高手过招,一点也不好玩!"王斌苦笑着说。这些人很多都是外籍华人,但长期的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浸润,让他们的习惯和做派"千奇百怪"、众口难调。面对各式各样的"刁难",王斌并不介意,总是尽量满足。时间久了,王斌的宽容加上相互平等、尊重的内地企业文化,反过来给爱出"难题"的高管无言的压力。

比生活习惯更难关照的,是"高手"们的精神世界。这些旅居海外多年的华人和纯粹的西方人一样,看重信仰,看重价值认同。如果王斌没法让他们对共同的事业充分认同,看到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希望,并唤起他们创造历史的热情和使命感,同样无法留住他们的心。

正是这些华人技术先驱,长期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喘息,也受尽海外同行的怀疑和轻慢:华人高科技从业者总是轻易被国外同行当做技术间谍;一模一样的一枚芯片,卖给中国企业一定要多加1美元……"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做贡献"的愿景,对于他们,就变得不再苍白,直至成为王斌和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愿景。

在正威半导体公司里,记者发现,几乎每一位团队高管都被冠以总裁的称谓,他们的办公室和王斌的房间完全"平起平坐"。或许,这就是高科技公司的企业文化,在这里,高科技人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,也一定程度上掌握企业的命运。

能轻易拿走的,就没有商业价值

也有人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,归结为知识产权在中国不受保护。没有底线的抄袭和模仿,的确会伤害创新的热情,但是否一定会制约高科技企业的发展,王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。"技术只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方面,基于市场的核心技术也很难被带走,轻易就被偷走的技术,就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可言了。"王斌说。

真正让王斌担忧的,或许是现在制定的半导体发展模式,是否必然指向成功。就如同正威在池州的半导体基地,就像一个开启梦想的试验田,将来的样子还没有人能说清道明。

王斌最欣赏的徽商精神,就是"徽骆驼"的勤勉与忍耐。除去高科技的光环,半导体产业的从业者从来都是一群寂寞的人,同时也是最能忍耐寂寞的人。也有人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形容成"沉默者的长跑",这亦让王斌深以为然。更让王斌感到鼓舞的,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一番寄语,"无论你们此番成败与否,都是为中华民族的半导体发展做了有意义的探索。"

40岁男人之间的对话,无需赘言,句句直指人心。

不惧风险并不意味着对风险无所作为。新技术会给整个产业带来颠覆性影响,政府领导换届也会对项目进展产生震荡效果,不断调整技术、操作方式甚至是发展方向,在变化中寻找新对策,是王斌每天要在头脑中飞速思考的事情。"我们这个产业,是刺刀见血的产业,来不得半点虚妄和迟钝,否则随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"说这话时,王斌目光如炬。

中餐馆的百年变迁:酸甜苦辣谁人知

华人在美移民历史达百年,曾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(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)任职40多年的心理学华裔教授劳思源(John Jing),日前在波特兰中国城举办讲座并售书,吸引了中国城附近300多民众前来聆听。他讲述的美国华人餐馆百年发展史让在座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。

全美国有超过4.5万家中餐馆,超过麦当劳连锁店。究竟是什么让中餐馆在美国发展到如此壮大?劳思源在演讲中与听众们分享了中餐馆的历史演变:"大铁路时代后,留在美国的华裔劳工从事过渔业、商业甚至是工业,而且大部分人都做得非常成功。可惜好景不长,美国排华兴起,华人艰难度日。存活下来的华人只能选择从事洗衣和餐馆这些劳苦行业。那时候的美国人对中餐惧怕万分,认为食材神秘诡异,更视中国城为险地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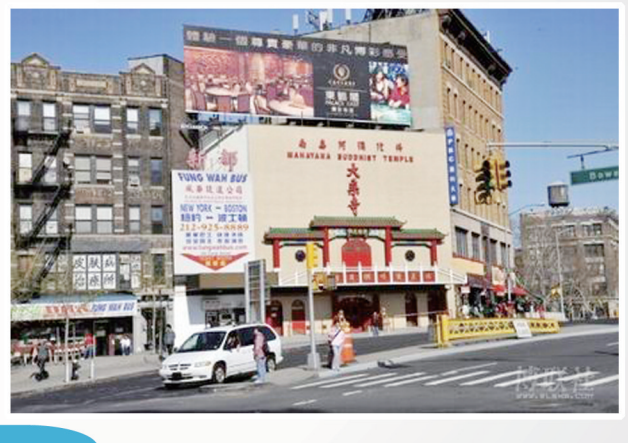
劳思源为大家展示了当时的报纸,警察在报文中明令禁止白人妇女在中餐馆和日本餐馆工作,以防止跨种族婚姻,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896年。有民间传说,那时,李鸿章来美访问,在中国餐馆吃到"杂碎"(Chop Suey)这道广东台山菜后大加赞赏。就此,"杂碎"在美国盛行开来,慢慢被美国社会接受。这个时期的中餐馆都必须标明有"杂碎"才可做生意。

后来,中餐在美国逐渐风靡,美国中餐馆也跃上了历史舞台。中国餐馆纷纷利用传统的装修、服饰营造异域风情,以此吸引当地客人,鼎盛时期,有的中餐馆甚至达到三层楼的规模。不过,与中餐的绝妙美味同时扬名的则是"糟糕服务",服务员语言不通,行为粗鲁,慢待客人,大大影响了中餐馆的生意。"吸收改变,不变关店"成了中餐馆在发展中不断面临的问题。保持原味还是美式中餐?这样的问题也一直伴随至今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餐馆生意让身居美国的华人有能力培育出优秀的下一代,其中包括律师、医生还有教授等专业精英。

劳思源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小城市梅肯(Macon Georgia),他们一家是镇上唯一的华人家庭。他的父母在当地经营一家洗衣店20多年。劳思源从加州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后继续深造,后在西北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。

劳思源这样介绍自己写书的原因:"有些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,但我都一直回避。在40多年的心理学教授生涯后,我终于开始审视自己的个人发展和转变。在这个白人和黑人为主导的社会中,作为美国华裔移民的第二代意味着什么?""在成长过程中,我非常难以理解我是谁。后来,我们搬家到了旧金山,我仍旧非常难以理解作为美国华人意味着什么。比起那些从小在加州长大,在华人社区成长的人,我还是不同的。于是,我选择忽略这个问题,做一名种族中立人。"

这样的经历让劳思源决心写下自己的故事,2005年,他发表了第一本书《南方的炒饭:在深入南方的中国洗衣店生活》。这本书让很多美国华裔第二代产生共鸣,读者纷纷来信反馈他所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。其后,劳思源又陆续发表了三本书:《中国洗衣店:金山存活的门票》、《棉花地的筷子: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中国杂货店》、《甜和酸:中国家庭餐馆的生活》。这些书都展示了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华人作为一个群体,在洗衣店、杂货店和餐馆业扮演的重要角色及百年演变。

劳思源在演讲结尾时说:"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中文名字的意思,直到有一天,一位读者对我说,你的名字就是饮水思源啊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也许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注定要写出这些东西,思源。" (李 娟)

海外华商